

中东格局新一轮调整的表征、动因及影响

唐志超

【内容提要】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格局经历冲突动荡期、域内外大国激烈博弈期、动荡变革期三个演变阶段，目前呈现出地区冲突、和解与发展并行，域外大国激烈博弈与地区国家强化战略自主交织，区域阵线分化和新旧联盟重组加快，地区形势发展与全球格局变化互动增强等重要特征。中东格局的新一轮调整既是过去十余年中东剧变持续演化和中东新旧矛盾叠加的结果，也是全球大变局在中东地区的折射，反映了域内外大国在中东力量对比的新变化。中东格局之变不仅对地区和平与发展、新中东秩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还将与全球秩序转型、国际安全、全球供应链重构形成密切互动关系。

【关键词】中东格局 巴以冲突 战略自主 中东秩序

近年来，中东局势变化迅疾猛烈，“黑天鹅”事件频发。地区涌现“和解潮”、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影响扩散、叙利亚变局、海湾地区加速经济转型改革、美国中东政策调整、大国竞争加剧与全球南方崛起等一系列新因素推动中东地区格局持续深入演变，给地区发展与稳定带来新的变数。

中东格局新一轮调整的主要特征

冷战结束后，中东格局由两极转向单极。随着后冷战时代的终结和西方霸权地位的动摇，中东格局也随之发生新的调整。当前的中东格局是在经历过去十多年地区剧烈动荡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格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化。

一是冲突动荡期（2010—2014年）。这一时期，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与“阿拉伯之春”对地区格局构成双重冲击。主要标志性事件有埃及、突尼斯、也门和利比亚四国发生政权更迭，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三国爆发战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中东，奥巴马政府决心结束中东战争并与伊朗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JCPOA），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

二是域内外大国激烈博弈期（2015—2020年）。这一时期，地区格局呈现美退俄进、东升西降、地区国家群雄逐鹿的特点。主要标志性事件有俄罗斯借出兵叙利亚重返中东，沙特和阿联酋联合出兵也门，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埃及、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下称“抵抗轴心”）三大阵营之间相互激烈对抗，地区代理人冲突加剧，特朗普政府奉行极端亲以色列和对抗伊朗的中东政策冲击地区力量平衡。

三是动荡变革期（2021年至今）。这一时期，战略竞争构成域外大国在中东博弈新焦点，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显著增强，阵营化对抗与区域局势缓和、发展同步演进。主要标志性事件有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并产生严重外溢影响，“抵抗轴心”与美国—以色列持续军事对抗，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突然倒台，“和解潮”推动地区关系缓和，海湾国家加快经济转型改革步伐，大国在中东战略博弈激烈，地区国家积极寻求加入上合组织与金砖合作机制。

当前中东格局变化与调整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范围之大、影响之广实为罕见，并呈现出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地区和解、经济发展与冲突对抗并存。目前中东地区呈现面貌多样、模式多元、发展多速、板块碎片化等特征。动荡的中东、缓和的中东与发展的中东并



(ahacai/C photo)



2025年4月27日，也门萨那，美军空袭后建筑受损严重。

存。一方面，自 2021 年以来中东出现“和解潮”，其中标志性事件是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与卡塔尔，沙特和伊朗，土耳其与阿联酋、沙特和埃及结束对抗，以色列与阿联酋等阿拉伯四国关系正常化，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启动对话进程，叙利亚重返阿盟等。与此同时，海合会国家、摩洛哥、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致力于经济转型，稳定中有发展。另一方面，地区冲突肆虐，阵营对抗加剧。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旧的争端尚未平息，新的冲突又大规模爆发，其中 2023 年 10 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迅速演变为数十年来巴以间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并严重外溢至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多国。

第二，域外大国主导作用下降，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意识显著增强，地区多极化加速发展。中东成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各方纷纷加大对中东投入。美国在中东影响力持续下降，拜登政府任期四年间在中东基

本无所作为，在平息加沙冲突、劝阻以色列升级冲突、恢复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续推“亚伯拉罕进程”、打造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打击胡塞武装等方面持续受挫。美国因在加沙冲突中偏袒以色列导致其在中东地区的声誉严重下降，拜登宣扬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因此成为笑柄。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因在加沙问题上采取带有种族清洗性质的极端政策而触怒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在中东有进有退，继续推进与伊朗、土耳其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的合作，与伊朗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支持吸纳中东国家加入上合组织与金砖合作机制，但在叙利亚遭遇重大挫折，其中东战略布局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以色列和埃及等地区国家不断加强战略自主，偏离西方战略议程，不仅打破了冷战时期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的传统，推行自主平衡外交，还力求主导地区事务，塑造地区发展进程，主场和主角意识明



2025年5月15日，加沙城，以军发动空袭，浓烟滚滚。

显增强，国际地位也明显上升。

第三，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影响极大重塑中东安全格局与地缘政治秩序。在遭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重创哈马斯和真主党，促使叙利亚局势骤变，破坏伊朗防空体系，严重削弱了“抵抗轴心”。而巴沙尔政权迅速垮台不仅使叙利亚发展方向剧变，导致域内外各方势力在叙影响力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局势也受到严重冲击，如土耳其在西亚北非势力进一步扩张、以色列北部安全威胁减弱并伺机侵吞叙领土、叙利亚务实化转型进一步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俄罗斯丢失中东战略基地一定程度上改变美俄战略竞争态势、“抵抗轴心”遭削弱或迫使伊朗改变外交和安全战略、黎巴嫩和叙利亚政治版图面临重绘、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全面退却、“伊斯兰国”死灰复燃苗头显现。

第四，地区阵营化对抗加剧，阵线分化重组加速，催生流动性地区联盟。土耳其—卡塔尔保守伊斯兰阵线

与埃及—阿联酋—沙特为首的阿拉伯世俗阵线、“抵抗轴心”与阿拉伯温和阵线之间的阵营化对抗已不同程度减弱，代理人冲突有所降温。与此同时，“抵抗轴心”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阵营对抗持续升级，并构成地区动荡的主要根源。伊朗与沙特、阿联酋、巴林从断交到复交，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从交恶到和解，土耳其与埃及、阿联酋、沙特三国由对抗走向务实合作，以色列与阿联酋、摩洛哥、苏丹和巴林四个阿拉伯国家历史性建交，引发敌友身份急剧变化，地区联盟频繁变动。

第五，地区形势发展与全球格局变化互动增强。动荡变革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中东剧变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大国战略竞争、乌克兰危机、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重塑均快速传导到中东。美国在对外关系上推行“美国优先”，鼓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局势紧张，在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中采取“双重标准”，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行径助推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奉行自主多元外交。中东国家“向东看”，积极寻求加入上合组织与金砖合作机制，体现了中东国家的战略觉醒，既推动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也提升自身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中东格局重构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东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域内外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与政策调整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中东格局的调整主要受三大因素驱动。

一是过去十余年中东剧变“长波”的影响。此轮中东动荡滥觞于“阿拉伯之春”，其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持续发酵，陷入内战的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三国至今未能实现和平，一些国家产生的权力真空一直未能得到填补，为内部极端势力崛起和外部势力干涉提供了土壤。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阿拉伯国家内部治理危机推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沙特、阿联酋和阿曼等国转向改革，推动“发展的中东板块”的形成。

二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及其外溢影响扩散。近年

来,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日益壮大,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巴勒斯坦建国前景黯淡。在此背景下,2023年10月, Hamas对以色列发起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不仅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还引发以色列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亲伊朗什叶派民兵之间的多条战线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不仅给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增添更大难度,还严重冲击地区稳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加剧阵营对抗、迟滞“亚伯拉罕进程”、削弱“抵抗轴心”、改变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政治版图、破坏美俄在中东的战略部署等。

三是域内外大国政策变动推进地区格局调整与地缘政治关系改变。“大国在全球的战略竞争加剧,推动了中东地区安全、政治、能源和发展格局的演进。”^[1]美国的政策调整是牵引中东格局调整的关键性因素。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三任美国总统均醉心于大国战略竞争,执行从中东战略收缩政策,以实现向亚太战略转移。然而,美国“撤而不退”,表面撤军,实则通过支持以色列、武装库尔德人以及空袭也门等加强对中东局势的干预,使地区局势出现动荡、失衡和失序。2025年5月特朗普对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三国的访问既凸显其中东政策的交易性,也显示出海湾地区已成

为美国在中东推行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区域。俄罗斯的中东政策经历了由积极重返到战略防御的转变。2015年俄罗斯借助出兵叙利亚重返中东,但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对中东投入明显减少。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极大缓和了中东地区安全形势,重塑了中东安全格局,为推动建立中东安全新架构奠定坚实基础。

美欧和俄罗斯聚焦于俄乌战场和亚太,无暇过多顾及中东,这为地区国家提供了战略机遇,它们开始自行制定政治和经济发展议程,在中东格局重塑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以色列政治右倾化,在图谋“吞并”巴勒斯坦的同时,意图“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力量平衡,削弱伊朗轴心,使以色列、美国及其盟友能够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地区秩序”。^[2]土耳其视全球格局变化与地缘冲突频发为黄金战略机遇期,以打造“新土耳其”为目标,以新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为理念指引,以军事干涉、国防合作、人道主义救援、危机调解为主要手段,试图在西亚北非、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东欧区域树立领导地位。阿联酋打破传统商业立国的局限,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频繁介入西亚非洲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沙特推行从内政到外交的全面战略转型,激进经济变革与大胆外交路线巩固了其在中东的领导

地位。伊朗在内外压力下调整战略,对内注重维稳和发展“抵抗经济”,同步推进在地区打造“抵抗轴心”和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实现和解,国际上通过加入上合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以及加强与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东方外交。

除了上述三大直接因素外,当前中东格局的演化还有着更深层次原因。中东地区存在的诸多矛盾催生了中东格局持续演化。

第一,大国干预与地区自主。这一对



2025年3月17日,叙利亚库赛尔,军人前往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



2025年5月8日，戈兰高地，以色列坦克仍在以叙缓冲区驻守。

数国家的共识。各国对发展的渴求使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成为本地区当务之急，各国外交战略自主性正不断增强。”^[3] 去意识形态化、国家利益优先的务实战略成为越来越多地区国家的主动选择。但是对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伊朗等国而言，安全的重要性依然超越发展，“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使这些国家陷入一时难以摆脱的安全

矛盾在中东长期存在。域外大国主导地区事务是中东地区常态，长期以来地区国家大多追随域外大国，接受外部安全保护。追求战略自主的国家往往遭遇暴力打压、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即使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也会因追求、维护自身利益而遭西方制裁。这形成了一个基本规律：外部干预弱，地区自主强；外部干预强，地区自主弱。当前，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干预显著减弱，由此为地区国家加强战略自主提供了机遇。

第二，安全主导与发展优先。中东国家面临安全与发展两难困境。长期以来，由于陷于冲突动荡环境并面临外部干预巨大威胁，大多数中东国家都将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作为优先目标，而将发展经济置于次要地位。长期冲突也消耗了巨额发展资源。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亚洲持续崛起，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冲击，迫使地区国家日益认识到没有发展就没有政治稳定，没有地区发展就没有中东安全。近年来，从北非到海湾地区，越来越多国家将发展作为最优先任务，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转型升级，以谋取长期稳定与持久安全。“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以及中东地区出现的其他和解进展，根本原因是追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本地区大多

两难。以色列与伊朗是这方面的典型。此外，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依然具有安全脆弱性。诸如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传统民族宗教矛盾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地区重大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制约着经济发展与改革转型。

第三，传统矛盾与新型难题。中东地区存在诸多传统冲突，诸如领土边界争端、民族矛盾、宗教与教派冲突、意识形态分歧等，衍生出巴以冲突、库尔德问题、逊尼派与什叶派纷争等难题，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当下，中东新旧矛盾交织，旧矛盾尚未解决又出现诸多新问题，加剧了地区动荡，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并非偶然，这与美国单方面偏袒以色列、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推进“亚伯拉罕进程”、打造反伊朗地区联盟紧密相关。

第四，全球变局外溢与地区内部脆弱性。中东地区的脆弱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位置独特、能源禀赋突出、对外依赖严重、国家实力较弱、地区内部矛盾众多、国家治理能力较低和外部干预频繁等多重因素决定了中东的脆弱性，导致中东易受外部冲击和对外深度依赖。全球化和大国竞争进一步增大了中东的脆弱性。“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与西方推动“颜色革命”、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有着直接关联。当下中东形势变化与国

际格局调整、大国竞争、全球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等关系密切。中东多极化的发展既反映了中东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也体现了全球秩序变革下的区域适应性。

中东格局演化的多重影响

当前中东格局的演化实际上是域外大国与地区主要国家之间权力再分配的博弈过程。由此,中东格局的变化与调整不可避免会对地区内外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从内部看,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地区国家关系缓和为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创造有利条件,但新格局过渡进程中存在的诸多复杂因素冲击地区秩序稳定性。一方面,地区“和解潮”得以持续,这有助于缓解冲突与对抗,降低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推动建设中东安全新架构。另一方面,新格局的过渡性会对地区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特朗普 2.0 中东政策存在不确定性,美国—以色列与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之间矛盾尖锐复杂,巴以冲突和库尔德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难以解决,叙利亚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持续存在,这些因素导致地区安全局势依然脆弱,地区发生新的重大冲突和“黑天鹅”事件的概率仍然存在。

第二,地区格局调整对地区发展与转型产生复杂而深刻影响。虽然地区经济改革加速,但政治和社会转型困难重重,地区分化日趋加重。以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海湾国家加速推进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推动人工智能、制造业、矿业、新能源、数字经济、旅游业、娱乐业等产业发展,引领地区发展。不过,海湾地区虽然成为中东发展的引擎,但也产生巨大虹吸效应,地区内外大量资金、人才涌进海湾地区,致使中东发展分化日趋严重,非海湾国家更加难以走出“低洼地带”。同时,虽然地区冲突肆虐,但中东地区一体化依然取得一些进展,包括海合会、东地中海、红海沿岸、以色列与阿拉伯建交国、土耳其与海湾国家等区域合作提速,为一向迟缓的中东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机遇。叙利亚变局后,海湾连通地中海的能源与交通走廊有望打通。因新一轮巴以冲突陷入停滞的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

常化、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在特朗普 2.0 时期有可能重启。中东地区经济改革与转型升级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依然面临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巨大压力。全球化、数字化、城市化加速推进,也带来地租型经济、青年失业率高企、人口膨胀、社会不平等、通货膨胀等问题,国家发展任务艰巨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形成强烈反差。

第三,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推动新发展道路探索。近年来,土耳其、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日益强调国家身份的再造,海湾国家、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等纷纷加大经济改革与发展转型力度。中东地区国家在维护政治稳定、推进经济转型、应对安全威胁、对冲大国博弈的过程中逐渐从被动转向主动,由跟随转向自主,在地区问题解决和塑造地区新秩序中由配角转为主角。中东国家加强战略自主,不仅是对地区国家长期以来主动或被动追求融入西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自觉纠偏,还有助于纠正地区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不平衡关系,有助于地区国家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进而实现“新中东”愿景。沙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等国积极扮演“国际调解人”角色,缓解大国间的紧张关系与地区冲突,力促俄乌、美伊(伊朗)、美胡(胡塞)、以哈(哈马斯)等多方开展对话,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从外部看,中东格局变化的影响也是多维度的,其中对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影响最为显著。一是中东格局变化有助于提升中东的国际战略地位。中东在 21 世纪沉寂近 20 年后再度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其战略重要性在大国竞争中仅次于东欧与亚太。当前,大国寻求中东地区国家合作的动力提升,操控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这实际上导致域外大国在中东的主导作用下降,中东面临域外大国干预的压力也随之减弱。地区国家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的压力减小,可以开展多元平衡外交,借助新兴大国力量平衡传统霸权国家,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同时争取利益最大化。埃及、阿联酋、沙特和伊朗等中东国家加入上合组织或金砖合作机制,提升了其国际地位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了全球



2025年5月10日，沙特吉达，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

南方的崛起，有助于国际格局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全球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体系完善。二是中东格局变化从国际安全格局调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全球移民难民等维度冲击国际安全。巴以冲突与乌克兰危机构成当前国际安全的两大热点。伊朗核问题是关于核不扩散的重要国际安全问题。随着特朗普再次上台，国际社会对该问题的关注将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美以对巴勒斯坦的联手打压、叙利亚新变局对全球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也有强烈刺激作用。三是中东格局变化重构全球价值链。这主要体现在中东由于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在国际能源格局中地位提高、中东作为战略枢纽牵引国际走廊竞争、中东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地位上升等方面。^[4]

结语

当前新一轮中东格局的变动具有连续性、骤然性、动态性、过渡性、内生性等特点。新的地区格局稳定性

差，是短期内各方力量博弈形成的脆弱平衡。这一格局在本质上仍属于从旧中东秩序走向新中东秩序的过渡形态。目前中东格局蕴含着向建立新中东秩序迈进的诸多积极因素，如在大国战略竞争态势下域外大国对中东倚仗需求的上升和控制需求的下降、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增强、意识形态淡化、发展优先日益超越安全主导等。这些积极变化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为中东由无序走向有序创造初步条件。在全球和中东这两个体系的转型中，“去西方化”、权力的“去中心化”和分散化日益成为一种趋势，这可能有助于中东未来实现和平稳定发展。^[5]但中东地区多极化并不意味着战略稳定一定能够实现，也可能造成尖锐冲突。展望未来，中东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格局，关键在于解决好大国干预与地区自主、安全与发展、根源性问题与现代化转型、深度参与全球化与内部存在脆弱性等深层次矛盾，当然也依赖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当代中东发展”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 孙德刚、章捷莹：《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格局的演进》，载《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2期，第29页。

[2] Mohamed Hussein Abu Al-Hassan, "Israel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al Order," October 29, 2024,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50/1204/534336/AlAhram-Weekly/Opinion/Israel-and-the-future-of-the-regional-order.aspx>.

[3] 张志文、张梦旭：《中东地区出现“和解潮”》，载《人民日报》2023年4月25日，第13版。

[4] 目前中东地区正在推动或建设中的交通走廊项目包括：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连接土耳其与海湾的“发展走廊”、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推动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摩洛哥的“大西洋通道倡议”、欧洲与北非的“南部绿氢走廊”、俄罗斯与伊朗推动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美国推动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

[5] 唐志超：《中东乱局的根源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3期，第10页。